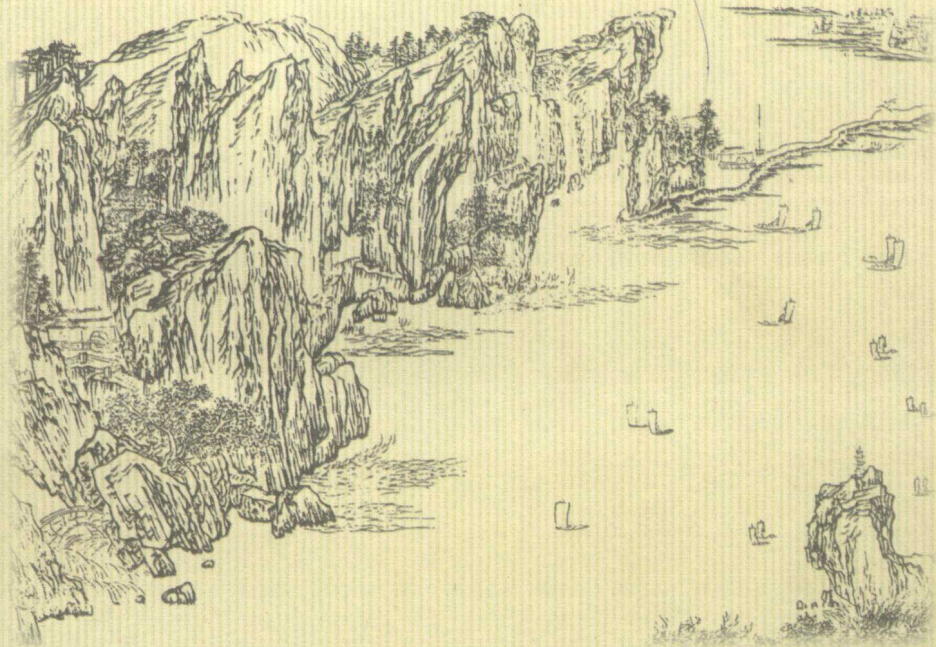


集部经典丛刊

苏轼文集

岳麓书社



I214.42
32
:1

苏

轼

集上

顾之川

校点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轼集/(宋)苏轼著;顾之川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0

(集部经典丛刊)

ISBN 7-80665-021-0

I. 苏… II. ①苏…②顾… III. 苏轼(1036~1101)-文集 IV. I21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4303 号

校 点	顾之川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胡 颖

• 集部经典丛刊 •

苏轼集

[宋] 苏轼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裕南文化印刷厂印刷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2.125

字数:1,400,000 印数:1-4,000

ISBN7-80665-021-0

I·517(上下册) 定价:6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树木岭航空路口 邮编:410014

前 言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市）人。我国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文、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苏轼幼承家学，深受其父苏洵的影响。童子时从道士张简易读书，即仰慕范仲淹等豪杰，“奋厉有当世志”。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当他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时，曾以范滂自励。后又从其父苏洵学习经史，“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随父及弟苏辙入京，与弟同中嘉祐二年（1057）进士，名动京师。后回蜀奔母丧。嘉祐四年，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针对当时财乏、兵弱、官冗等弊政，苏轼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任满时，其父病故于汴京，他扶丧归里。神宗熙宁二年（1069）还朝时，适逢王安石变法。因他与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多有不合，而他的意见未被采纳，遂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到元丰二年，先后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地方官。其间，他曾惩办恶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因何正臣等人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苏轼遂在湖州被捕，投入御台狱，即所谓“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后，于同年十二月结案，贬谪黄州。元丰七年，改贬汝州。在这期间，他虽然表面上表示要闭门思过，但他不甘寂寞，仍留心时事，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任中书舍人、

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又因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不计利弊，尽废新法的做法，开罪于旧党，遂于元祐四年，第二次出知杭州。元祐六年，被召回，又受到贾易等人的诬告，不得不“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往颍州、扬州、定州任地方官。其间，他或减赋赈荒，掘湖修堤；或整顿军政，加强边备。绍圣元年，哲宗亲政后，新党得势，苏轼又被一贬再贬，远放到“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英州、惠州、儋州。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后，才遇赦，授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便，他才北归常州，准备安度晚年。不料天不假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卒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谥文忠。

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同时又杂有佛、道思想。青年时代的苏轼，具有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太平盛世，慨然以“尊主泽民”“致君尧舜”而自任。当他认识到政治上的积弊时，立志“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然而，宦海沉浮的蹭蹬命运，一方面使他有接触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使他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和统治思想对个性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加上他超脱达观，游于物外，才气横溢，诙谐善谑，妙语如珠，因而并不费力地为自己找到一条精神解脱的途径。

他一生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直言敢谏，更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衎《梁溪漫志》），他弟弟苏辙说他“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东坡先生

墓志铭》)他自己也承认:“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因而他与时代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都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时代的内心苦闷。

苏轼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文化巨人,于诗、词、文均极有造诣。他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开创了豪放词风,他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同列为“唐宋八大家”。他的书法、绘画也自成一派。

苏轼的人生道路是曲折的,但他的文学创作却是异常成功的。他以其高洁的人格力量和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品,征服了当时和后世的无数读者,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闾巷田农的一致称赞。他早年的内制文,成为应试举子作文的范本,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当时就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民谚。“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李绍《重刊苏文忠公集序》)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学家,有所谓“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称。就连他的政敌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西清诗话》)在他死后,南宋孝宗皇帝不仅亲自为《东坡集》作序,而且厚待其孙苏峤,称其“不可夺者峤然之节,莫之制者自然之名。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元代虞集谓金代文家“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道园学古录》卷三三《庐陵刘桂隐存稿序》)明代李贽说:“苏长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惊天动地。”(《焚书增补二·复焦弱侯》)清代翁方纲也有“苏学盛于北”之说(《石洲诗话》)。

苏轼的著述甚丰,有诗文合集《东坡七集》,词集《东坡乐府》,笔记杂纂《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学术著作《易传》、《书传》、《论语说》等。

二

苏轼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也是宋诗的卓越代表。他的诗现存 2700 多首，题材异常广泛，各体兼备，尤擅七言古体和律、绝，内容广阔丰富，艺术手法变化多姿，因而成为李、杜之后的又一大家。

首先，抒写乐观旷达的情怀，表现对生活的执着热爱，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苏轼性格豪放，恃才傲物，行为比较放纵。尽管受贬以后，作品中仍表现出一些达观的思想，因他本不是一个消极颓放的人，而且“窜游万里”，饱览奇景伟观，所以胸襟较为开阔，始终保持乐观和幽默。“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第二首》），唱出了他雄姿英发的凌云壮志。“人生百年寄鬓须，富贵何啻葭中莠”（《将往终南和子由见寄》），透露出他对人生的感慨。被贬黄州时，他说：“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过淮》）“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在被认为蛮荒之地的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在海南，他认为“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由海南到儋耳，他写道：“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渺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苏轼大量的和陶、咏陶诗，更表现了他与陶渊明高洁旷达情怀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可以说，他是以旷达的宏观心理看待人世的悲欢炎凉的，尽管其中未尝没有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

苏诗中还有大量的歌咏山水之作，描写地方风物，勾勒奇绝风光，再现名胜古迹，展示众生世象。他还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赏喜悦的心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无不昭示着他对生活挚着的热爱。

其次，苏诗中也有不少关心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抨击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写官府为了开河运

盐，像驱赶鸭与猪那样，强迫农民放下农活，开挖河道，虽大雨滂沱而不止！《吴中田妇叹》更以简练的笔触，勾勒出农民盼望稻熟的急切心情，久雨不能收获的焦燥，卖牛拆屋的无奈等等走投无路的窘迫。《许州西湖》喊出“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枪”的苦乐不均。《山村五绝》则揭露了盐法和青苗法的“病民”“害民”。“斯民如鱼耳，见网则惊奔”（《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而今风景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都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关切之情。其他如《荔支叹》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大小官僚的“争新买宠”。《和钱安道寄惠建茶》《鳊鱼行》则流露出他对钻营小人的鄙视和憎恶。《和子由园中草木十一首》借咏草木花卉，抨击了小人朋比为奸的行径。需要指出的是，苏轼的这些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他针对新法缺点的“有感而发”，是用诗的形式对政敌的声讨和控诉，表现了一个封建社会正直官僚兼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感。

再次，苏诗中还有相当数量与友朋后辈唱和应对的作品，表现了他对人才的爱护和期望。作为北宋文坛领袖，他与当时多数诗人都有往还唱和。或对朋友诗作激赏，或对后学提携奖掖。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这种人才意识，甚至及于乞儿和草木虫鱼。《刘丑厮诗》就写他对一个十二岁乞儿的智勇行为，写了作者对他的安顿和希望。看到放生的鱼，他发出“安知中无蛟龙种，或恐尚有风云会”（《西湖秋涸……戏作放鱼一首》）的感慨；见到一片树苗，他产生“稚杉戢戢三千本，且作凌云合抱看”（《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的联想。在偶然的随物触发中，表现了诗人博大仁爱的胸襟与情怀。

就艺术风格而言，苏诗壮阔奔放，铺叙宛转，想象丰富，奇趣横生，又长于譬喻，引人入胜。尤以七古最具特色，自然而多变化。或豪放恣肆，或刚健雄浑，或清丽秀美，或奇幻精警，或旷达放逸。构思上，往往具有新颖独特的感受、巧妙妥贴的比喻、出人意外的联想；结构上，常以自己的情感变化为主线，于跌宕起伏之中，酣畅

淋漓地表情达意；语言上，注重平淡自然，尤其推崇陶渊明诗中的“高风绝尘”，因而他的诗中也往往蕴涵着诗人的高风亮节和超越世俗尘土羁绊的高韵雅致。

苏轼以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获得了宋诗霸主的地位。人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评价宋诗，必要提到他。如，惠洪有“苏、黄一时顿有，风流千载追还”的诗句（《石门文字禅》卷十四）。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云：“元祐之间，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竞以己意相高，而诸作又废矣。自此以后，诗人迭起，或波澜富而句律疏，或锻炼精而情性远，大抵不出于二家。”（《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严羽《沧浪诗话》云：“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赵翼《瓯北诗话》说他“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

当然，宋诗中普遍存在的散文化、好议论、爱说理、喜卖弄等等缺点，在苏轼诗中也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从而大大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整体艺术成就。这也是勿庸讳言的。

苏轼又是一个在词史上具有特殊贡献的词人。他以前的词人，大多沉溺于“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雕章琢句、比声协律地填词。内容或是闺愁别恨，儿女情长，或为写景咏物，吟风嘲月，风格以婉约、柔媚纤巧为正宗，题材范围非常狭小。到了苏轼，他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他以其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变“填”词为“作”词，从而大大拓展了宋词的苑囿，提高了宋词的表现力。

苏词才兼众体，能刚能柔，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从他现存的340多首词来看，他对词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也用词写闺情别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悲欢离合（《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满江红》“江汉西来”）、旅途凄凉（《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等传统题材，写来笔墨细腻，风流婉转，缠绵纤媚，凄切

感人。但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用词写他“奋厉当世”的理想抱负（如《孤馆灯青》、《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的生活态度（《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自己的人生感受（如《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念奴娇·赤壁怀古》），展示他高歌入云、慷慨激昂的精神风貌，抒发他逸怀浩气、高洁旷达的情怀。读来更觉雄健顿挫，激昂排宕，逸兴满怀，浮想联翩。甚至田园风光、山水景物、以及咏物记事等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

前人认为，苏轼词有两大缺点，一是“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二是“不协音律”（《易安居士事辑·词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墨客挥犀》）。其实，这两点算不算真正的缺点，就连古人也有争议，如晁无咎就认为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历代诗馀》引）。吴梅《词学通论》：“子瞻胸襟大，故随笔所之，如怒澜飞空，不可狎视。”至于正面肯定的意见就更多了。如曾慥《跋东坡词拾遗》中说，苏词“豪放风流，不可及也。”刘熙载认为，苏词“若其豪放之致，则与太白为近。”今天看来，我们未尝不可说，他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使词从艳体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抒情咏怀的新诗体。

三

苏轼继欧阳修之后领导了北宋的古文运动，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的散文理论，为散文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他的散文创作，也代表着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

（一）议论风发，不为空言。

苏轼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善议论”（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这一点，在他作于仁宗、嘉祐年间的策、论和作于神宗熙宁

间的奏议最能证明。当时的苏轼，正是“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锐意实现其“当世之志”的时期。所以，这些政论文，表现了他对时弊的忧患和变革弊政的急切心情，针对当时的社会实际，议论风发，直抒胸臆，行文直率，不为空言。如《策略》一的开头，就单刀直入地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所以大惑也。”

表面上看，似乎是危言耸听，故意夸大其辞，其实句句都是事实，可谓一语道破仁宗朝的危机。

他敢于这样议论朝政，丝毫没有有什么个人目的，完全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于极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绳之以法度，考之于有司。”“臣愚不肖，诚恐天下之士不获自尽，故尝深思极虑，率其意之所欲言者为二十五篇，曰‘略’曰‘别’曰‘断’。虽无足取者，而臣之区区，以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终篇，既明其略而治其别，然后断之于终，庶几有益于当世。”正是他这样出之以诚，称心而论，没有铺张扬厉，却情辞迫切，雄辩滔滔，挥洒自如，使皇帝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观点。

（二）师法“自然”，不为而工。

苏轼为文主张师法“自然”，不为而工，因而在修辞上不如欧阳修等人严谨。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而苏洵却说：“言无有善恶也，苟有得乎吾心，则其辞不索而获。”苏轼更不受什么章法限制，纵笔所至，常能随心所欲，任性使气，通达自由，必酣畅淋漓地表情达意而后止。甚至在决定其前途命运的进士考卷

《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他也能仅凭“想当然”就编造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圣贤典故。这是一般的文人士子不能为也不敢为的。他曾在《文说》中充满自信地宣称：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与谢民师推官书》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他在《南行前集叙》中更点出了“自然”的实质：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从有意作文求工的理想王国，到无意作文而无不可称工的自由王国，他的散文便进入了一个“不为而自能”的艺术境界。因而沈德潜认为：“东坡之才大，一泻千里，纯以气胜。”李涂《文章精义》在比较韩、柳、欧、苏的文章时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明代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随事记录便是文。”（见其批《书天庆观壁》语）

（三）以意为工，意尽言止

苏轼非常强调“意”在作文中的作用，重视在“意”的支配下那种自由挥洒、变化万端的艺术风格。他并不把文章看作单纯的

“载道”工具，只是一般性地提出作文要“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要“有为而作”（《晁绎先生文集序》），甚至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日喻》），即只能从实际中去体会。他常用迂回的方法，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方面的作用，肯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造的价值。《进策总叙》说：“臣闻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近于可用，出于其意之所谓诚然者。”他甚至认为，作文的唯一目的，就在于表意。他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史之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足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韵语 阳秋》卷三）他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作为“衡文”的标准。他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如《范增论》《留侯论》《韩非论》《贾谊论》《晁错论》等等，往往能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翻新出奇，得到出人意料之外、又能为人默许的结论。

在苏轼的后期散文中，由于政治上的打击，取代前期那种雄博浩瀚的议论文字的，是抒情寄意的篇章。他“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先生墓志铭》）于是，寄情山水，超然物外的色彩浓厚起来，使他无施不可的才力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诗的意境在散文中也有了更多的表现。因而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为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

（四）文尚简明，务求通达。

中唐以来，士子为文，每以“怪”“涩”相高，欧阳修知贡举，“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事毕，向之器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头，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欧阳修主张文章的内容应该重于形式。他说：“道

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苏轼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更以他奔放的才气，将欧阳修的散文主张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为文必须简明通达。因此，他既反对“浮巧轻媚，丛错彩绣”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的时文。他在进士及第时给欧阳修、梅圣俞的信中，就说他不学“求深”“务奇”的时文，坚持“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与黄鲁直书》：“凡人文字，当足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在他大量的记游散文中，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承天寺夜游》，用简洁明快的文字，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个澄净空明、意趣通脱的境界，如诗如画，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等点睛之笔，更令人叹为观止。

在艺术风格上，苏轼常常把议论、描写、抒情等手法结合起来，交错运用。论理深入透辟，叙事准确分明，写景生动形象，气势纵横驰骋，结构变化多姿，语言明快畅达，或散文而间以韵语，或赋体而贯注着散文般奔泻而下的气势，因物赋形，汪洋恣肆，变化跌宕，波澜层出，确实达到了他所说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艺术境界。

总之，苏轼以其卓越的理论探索和大量的创作实践，完善了古代散文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散文的表现技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使明白晓畅、平易自然的文风成为后代散文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苏轼也是宋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尽管他流传至今的赋只有25篇，但仅凭同为赋体名篇的前后《赤壁赋》，就足以使他成为赋体大家。苏轼赋除少数几篇颂圣论政的外，其他都是抒情寄意之作，对人情物理具有较为深刻的描写和分析。大体说来，前期赋基本上是古体赋，气势雄拔，表达的是犯难忘身、立功当世的壮志。后期赋写得自由畅朗，富于诗情画意。尤其是《赤壁赋》，表达了作者失意、苦闷和以达观求解脱的复杂心情，情感由在秀美如画的江山水月之

中的潇洒转为功业破灭后的悲怆，最后归结于物我两忘、游于方外的解脱，转换自然，自由流荡，感人至深。方苞说：“所见无绝殊者，而文境邈不可攀，良由身闲地旷，胸无杂物，触处流露，斟酌饱满，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岂惟他人不能摹仿，即使子瞻更为之，亦不能如此调适而畅遂也。”（《评注古文辞类纂》）

此外，苏轼的书画艺术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书法上，他长于行、楷，笔法肉丰骨劲，“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东坡先生墓志铭》），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代书法四家”。传于今者，尚有《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卷》《与张天觉书》《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卷》等。在绘画上，他主张“神似”“传神”，提出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著名论断。他善画竹石，曾自信地说：“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次韵子由憩寂图后》）今尚存有《古木怪石图》等。

四

苏轼作品集，历代有不同的编法。大致说来，主要有诗集、文集和诗文合集三种编法。苏轼诗有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诗》（又叫“百家注”）二十五卷，有黄善夫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编年注本，即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有宋嘉泰刊本、景定补刊本，均已残。清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苏轼诗集》（1982）共五十卷，其中第一——第四十六卷用王文诰本，第四十七——五十卷用冯应榴本。苏轼词较常见的是朱祖谋编年本《东坡乐府》三卷，有龙榆生《东坡乐府笺》本。苏轼文在宋代就有多种刊本，最早的选本是南宋邱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有《四部丛刊》影宋刊本。明末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本只有文和词（其中后二卷为词），为中华书局《苏轼文集》（1986）七十三卷本所沿用（书后有点校者辑《苏轼佚文汇编》七卷）。其诗文合刊本，宋代就有《东坡集》《东坡后集》等。明成

化四年（1468）程宗刊《苏文忠公全集》（包括《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另附《乐语》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东坡续集》十二卷及《年谱》一卷）一百一十二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本。

五

《苏轼文集》以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按写作年代重新分类编排。后人所辑《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凡有定评确为苏轼所作的，按以类相从的原则编入苏轼文。苏轼的代制御诏文，则未收入本书。

1 原准备将苏轼的诗、词集合编在一起，列入岳麓书社的《集部经典丛刊》，但考虑到岳麓书社已经将苏轼的诗、词分别编入了《东坡诗山谷诗》《宋十大各家词》两书中出版，所以此次只单独出版《苏轼文集》。

2 原本所用异体字、俗别字，一律改用通行的简字，不另加说明。

3 原本疑有错字，在该字后以（ ）注明应作×字。

4 原本疑有两字相倒者，以（ ）注明“疑应作××”。

5 原本疑有衍字，以（ ）注明“疑衍×字”。

6 原本疑有脱字，以（ ）注明“疑脱×字”。

由于水平有限，整理中一定会有不少错点和谬误。这里谨以蒋礼鸿先生在《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序目》中引敦煌变文题记中的一段话作结：“或见不是处，有人读者，即与政（正）著！”

参考文献

《宋文选·前言》，四川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苏轼评传》，曾枣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苏轼文学论集》，刘乃昌，齐鲁书社，1982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苏轼”条，刘乃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苏轼散文集·前言》，史慕鸿、过常宝，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东坡诗山谷诗·前言》，刘乃昌，岳麓书社，1992

《中国散文通史》下卷，漆绪邦主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顾之川

于京华芳古园之思无邪

1996年10月31日